



文艺学系列教材

中国古代文论

(修订本)

李建中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论

(修订本)

主 编 李建中

编 者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新华 向柏松 吴中胜

吴建民 吴 艳 李建中

胡立新 董 玲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武汉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论/李建中主编. —2 版.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1

ISBN 978-7-5622-2594-2

I. 中… II. 李… III. 古典文学—文学理论—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64590 号

中国古代文论 (修订本)

主编:李建中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电话:027-67867076/6786304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部)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ccnp.com.cn>

经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责任编辑:谢 琴

封面设计:甘 英

开本:787mm×960mm 1/16

版次:2007 年 1 月第 2 版

印数:1-5000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责任校对:崔毅然

督印:姜勇华

印张:22.125 字数:397 千字

印次: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9.00 元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新版总序

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专业的教材建设,起步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1958年编写的教材,突出若干政治倾向鲜明的文艺观念,打上了颇浓的当时环境的印痕,显得有些粗糙。六十年代初期,各位主讲教师逐年修订,加强了文学基本知识的介绍。到了1989年,孙子威教授主编的《文学原理》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总结了主编本人和他带领的团队长期研究的成果。同时,王先霭、范明华撰著的《文学评论教程》于1986年出版,并在1988年被国家教委定为高校文科教材。到了九十年代末,新世纪将要来临之时,适应新的需要,在集体进行多年教学研究的基础上,作为教育部重点课题“文艺学课程体系的改革研究”的成果,出版了文艺学系列教材三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文学文本解读》)。以后这套教材的品种陆续增加,并邀请外校教师参加编写,迄今达到九种,都曾多次重印,有的还出了修订本。新增加的教材,都是主编和参与者多年研究和教学心得的结晶,比如,张玉能的美学研究,胡亚敏的比较文学研究,孙文宪的现代西方文论研究,李建中的古代文论研究,都有诸多成果,并获广泛好评。

我们的文学理论教材,它所阐述的文学观念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对几千年中外文学现象的概括,从文学现象的实际中经过科学的抽象提炼出来;二是对几千年中外文学理论有选择地继承、扬弃,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刘勰的理论的继承和借鉴,直到对别林斯基、德里达、梁启超、王国维的继承和借鉴;三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推导,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的阐发。我们是以进入文学史的文学经典为主要根据,主要讲适用于历史和现实一般情况的基本规律。放弃这个,把文学理论教学变成讨论当前热点的讲座,并不适宜。但我们讲的基本规律,要能帮助学生观察当前文学,而当前的文学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我们意识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文学理论教学曾经基本上是讲比较单一的文学观念。到现在,我们处在多种文学理论的众声喧哗之中,再也没有可能无视其他文学理论体系的存在了。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1948年第一版序中说:“我们既不像德国人那样折衷,也不像俄国人那样教条。”他们的编写原则是:

“在研究中听取国际上各种不同的意见，提出恰当的问题，提供方法上的基本原则。”我们比之他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也有更明确的原则来引导学习者作出自己的判断。

文学理论教材有理论体系和叙述体系，叙述体系必须以理论体系为支撑，教材编撰者没有系统的文学理论观念，教材会是支离破碎的，把理论体系现成地搬到教材之中，却不见得符合本科学生的接受心理。理论体系体现教材编者的见解，不同学派有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逻辑起点，有不同的基本命题，有不同的范畴概念，很难平行介绍。理论体系必须符合理论逻辑，叙述体系则要由易而难、由浅而深、由感性而理性，要打破理论体系的结构另行处理。我们的教材，重叙述体系，重现象，重知识，重实际，围绕理论问题介绍历来和当前主要的观点，把若干学派的观点打散后纳入教材的叙述体系之中，努力使我们的教材和教学既是系统的，又是丰富多样的。

教材的叙述体系要考虑到学生接受的思维特点，考虑由具体到抽象的循序渐进。例如，《文学理论》一头一尾讲文学的基本性质，中间讲文本，讲创作和接受。我们觉得，对于本科学生教材的论述不宜太抽象，要多联系具体文学现象来讨论，主要给学生方法和知识。一本教材要有一个完整的叙述体系，这一套教材也追求一个大的体系。

教材建设是没有止境的，教材撰写总是一种遗憾的工作——一本教材刚刚出版，新的观念、新的思路又产生了。诚恳地期望使用者、读者提出意见。

王先霈

2006年12月15日

原版总序

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文艺学系列教材,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文学文本解读》、《美学教程》、《西方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比较文学教程》、《中国古代文论》等八种,是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的有益探索。关于文艺学教材改革,我有以下粗浅想法,和这套书的各位作者作过交流,也以此就教于教材的使用者。

首先,我们过去文学理论的基础是很狭窄的,主要是建立在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基础之上。而今天,怎样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各种各色文学纳入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把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把纯文学和杂文学,都纳入文学理论研究的视野,使我们的理论体系有足够的覆盖力,又不使文学理论成为碎片的聚合,又能构成理论的自足的体系性;构成教材的叙述的体系性。这实在是一个大难题。

其次,文艺学教材与理工类教材不一样,那些学科可以直接把国外优秀教材原样引进,可以不用翻译而用原版,没有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障碍,也没有文化上的障碍。文艺学是人文学科,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里面蕴含着民族文化的根基,文学总是具有民族性的,文学理论不能不带有本土性。一百年来,创建具有本土性的文学理论收效不如人们的预期。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西方古典的文学理论,西方现代的文学理论,各成系统,光是西方现代文学理论就已经是五花八门,要在—本基础理论教材里完整描述,那是很难很难的。但是,本科—二年级基础课的文学概论只介绍其中一种或几种,让学生以为某一种两种才是最科学的、基本的文学理论,那又是否合适呢?

第三,应该说,二十年来,文艺学研究有了巨大的进展,但文艺学研究成果向教学领域、教材编写领域的转化的速度和效率却不如人意。这种转化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容易,教材内容的先进性和稳定性的关系的处理,教材包含的学术的新颖创见与教材综合国内外学术进展所达到的全面性、准确性,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这两者关系的处理,也是教材的编写者的学术个性和教材涵盖当代学术进展的客观性的关系的处理,这是教材编写中很困难、很能考验编写者功力的问题。

第四,从教材的适用性来说,教材的叙述方式应该与学术专著有明显区别,它应该给教师留下发挥的空间,应该对学生进一步的阅读钻研作出提示,具有启悟性。一本教材不可能告诉学生本学科基础知识的全部,只能是给学生的学习竖立路标。它的形式、编排格式也应该活泼可亲,而不应该是一口气讲到底的高头讲章。这一方面,西方的某些教材值得借鉴。

第五,大学教材的影响和功能不只是在校园之内。如今是每个人终身学习的时代。社会对普及科学的文学思想、文学知识有迫切需求。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受过基础教育的人群中,当时文学的基础常识是有一定普及程度的。大批干部,都“学一点文学”。今天,大学理工医农学科的学生,乃至中高级研究人员、政府官员,面对当今纷繁的文艺现象和多元的文学理论,也常常显得不知所措,更不要说一般平民百姓了。甚至宣传文化部门的主管人员,也缺乏对现代文学理论的初级的知识,而且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取这些知识。视觉传播帝国的不断扩张,帝王戏、警匪片、流行曲、大话王,它们对社会审美观念的影响,专业人士如何应对?对一篇作品、一种文学艺术现象的迥然相异、相反的态度,有时是由知识结构的巨大差异造成的。文学理论工作者,高等学校专业教师,有责任向社会提供具有可信度和科学性的文本,这其中,很重要的、具有权威性的,就是经过实践检验而被文艺学同行认可的好的教材。

第六,除了单本的教材之外,还有课程体系问题,相应地就有教材体系问题。许多年来先后比较普遍开设的文艺学课程有文学概论、马列文论、文艺美学、古代文论,这种课程结构是不是需要做些改变,有加有减、有增有删?如果要变,又怎样改变?近年来有一些探索,还需要更大的一点动作。这里有文艺科学的体系的严谨性问题,也有当今大学低年级学生的实际知识和能力的结构、接受水平问题,还有在中文专业课程设置中间的可能性问题,教育部倡导教材配套,立体化开发,多媒体课件的制作,针对多层次教学,辅导书、参考书的编写,其中还有大量工作可做。

教育部印发的《关于“十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的意见》的

“通知”说：“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是进行教学的基本工具，也是演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因此，高等教育教材建设必须有一个与之相适应的快速发展，‘十五’期间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我们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投入教材建设。以上所说各点，是我们遇到过的困惑，也是我们在这套教材编写中力图解决、力图有所创新的几个方面。至于究竟做得如何，要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先霈

2002年9月

《中国古代文论》序

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学科是由大学里的学者们建立的，他们的研究和教学同步进行，他们的著述，有很大一部分是以教材形式出现的，开初如此，至今依然。李建中教授主编的这本《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成果。

这门学科诞生于 20 世纪前期，十分年轻，但它却承袭了两千多年悠久的传统，有着绵远漫长的史前史。它的古老，是由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历史的悠久，是由于中国人对文学的议论和思考的历史的悠久；它的年轻，是由于原先没有诞育的客观条件，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的古人缺乏明确的学科意识，系统的严密的学科的建立只能是在现代来实现。两千多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论述，蕴藏在各朝各代浩如烟海的典籍里面，要发掘和鉴别它们，需要借助古典文献学的帮助；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伴而生、相随而长，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史又依靠着文学史研究的进展；尤其重要的是，前人的论述的价值，要从一定的理论立场出发去判断，决定去取，阐发其内涵并给予评价，作为学科据以立足的出发点，这种理论立场当然应该是发展成熟的、完备的某种立场，所以，只有有了严密的、体系化的现代文学理论，有了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明确的、深刻的认识，才有可能建立文学批评史学科。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才出现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原因。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存在的根据，在什么意义上我们确认它的存在。现在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和遵行的“文学”的概念，就其理论内涵而言，基本上是 20 世纪初从欧洲引进的。西方的“文学”概念，从西方文学几千年的实际里提炼而出。西方文学的实际和中国几千年文学的实际并不完全相同，而且有着不小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讨论的文学类型是史诗和悲剧，而从孔子到刘勰都没有见过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和悲剧，因此，孔子、刘勰的文学观和亚里士多德相差很大，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和欧洲古代的文学观相差也很大。20 世纪中国的学者以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欧洲“文学”观念为参照的标尺，重新审视、整理孔子以来关于“文学”的议论，在

开辟新境界的同时,一开始在对象内容的取舍、评价上的扬抑和诠释的向度等方面也就有圆凿方枘的困惑。不仅批评史研究如此,这也是当时中国人文学科研究者普遍的困惑。冯友兰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①中国的历史上,是不是存在与西洋人所谓的“哲学”或“文学批评”等同的学问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在20世纪前期,我们还只能借用西洋人的眼光,作为近现代意义上学科门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哲学史”是以西方文学、史学、哲学的学科构架和概念系统为规范来建立的。于是,本土思想资料的实际和外来的学科模式之间的距离和冲突,成为学者们越来越尖锐地感受到的—大难题。七十多年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历程中,在解决这一难题的过程中,在本土古代思想资料的发掘整理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学观念大大地深化和细密化,而两者的结合和相互促进也不断出现新的路径和形态。当然,不免在新的层次上遭遇新的困境,给研究者提出新的课题。我们回顾七十年来的学科史,本身就需要有历史的眼光和态度,既不能苛求早期的拓荒者、奠基者,更不能扼制新进们创新的努力。本书作者力图在反映学术进展的同时,提供新的视角,我认为,他们的劳作是应该肯定的。

古代人求知、治学,研究自然和社会,很长时间内没有自觉的学科区分。大家都向纵横两方面尽力延展,都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读书人长期信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②的原则,欧洲11世纪到14世纪的经院哲学、特别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后期经院哲学,内容同样是无所不包。大约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自然科学逐渐分成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六大学科,并且其后不断重新分化、组合。到了18世纪中期,又形成了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人文学科出现较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原先是神学的对立物,进入20世纪,才作为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立的学科类型。在上—次世纪交接之时,科学研究的规范从西方传到中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致力于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并从文学研究的大学科里产生出若干分支学科;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研究,也分别划出若干专门的领域,于是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尝试紧随着文学史、戏曲史和小说史著述的问世之后出现。

最先拿出这方面成果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外国学者,是欧洲的和日本的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1版,中华书局,1961年,第1页。

^② 汉代扬雄《法言·君子》:“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崔寔《河间相张平子碑》:“一物不知,实以为耻。”《南史·陶弘景传》:“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深以为耻。”

汉学家。德国人威廉·顾路伯(Wilhelm·Grube, 1855—1908) 1902年在莱比锡出版了《中国文学史》，20世纪日本早期汉学家盐谷温著有《中国文学概论》，两书中都略有关于文学思想的介绍。另一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1925年由东京弘文堂出版的《支那诗论史》，为三篇长篇文章，即《周汉诸家的诗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和《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的合集。我们从铃木的论述中可看出19世纪欧洲文艺思潮的影响，具体说来就是唯美主义超功利的文学价值观的影响。重视文学的独立性、特殊性，或隐或显地承认文学的某种程度或某些范围的超功利性，导致将对文学的审美的观照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将文学批评史从哲学史、政治史、道德史中离析出来。日本学者的著述，欧美文学思潮的直接和间接的触动，帮助中国学者从经学的拘束中解脱，把文学当作文学，当作不同于伦理、政治的审美活动；把文学理论批评当作文学理论批评，不同于一般的人生论、社会论。这种思想范式的转型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前提，其他学科如此，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①。

铃木从文学整体出发研究文学批评，他的思考较为深刻和富有活力。无可否认，他的这本著作，不论从时间的纵向线索还是文体的横向幅度看，都很不完整。他本人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说：“……至于以‘诗论史’而不以‘文学理论史’为名，是因为论述主要在于诗的方面。此外，书中对唐宋金元部分的论述过于简略，对清代嘉道以后时期尚付阙如，而对这些阙遗之处的补充，或者进而更改书名，修改充实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史》，则有待于日后的努力了。”他所期待的努力，由中国学者自己实现了，此书出版之后两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问世了。

“五四”以后的时期，是现代学科建设的发轫期。胡适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到，他们那一代人，企图在中国文化史上“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这个“革命”有两大目标，一个是中国文学史，一个是中国哲学史（或者叫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恰是两者的交切与结合。形容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是强调其“价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的任务^②；而价值重估的出发点，便是新的观念，这也正是新学科建立的前提。一个学科要从无到有地建立，必不

^① 鲁迅1927年9月在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

^②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47页。

不可少的是提出对它的性质、基本概念的看法,并且要搭起一个哪怕是初步的框架。胡适一辈的学者,不是从对本土遗产的批判中生产出新的观念,而是从外面输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基本的概念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也是从欧洲引进的。陈中凡肩起了用外来的新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论述的价值、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框架的工作。紧接着,一批学者以各自的努力,共同奠定构建学科大厦的基础。

陈氏何以想到撰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呢?他的著述研究的心理动因和铃木虎雄等外国学者是否有所区别?据他在《自述》中说:“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文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20世纪初期的一股潮流,所谓“科学方法”,乃是指由西方接受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和古人、同时代的一些人乃至后来的人有所不同,陈中凡不再局限于从目录学、文献学角度看待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著述,1936年他和蔡尚思讨论编撰《中国思想史》,明确“叙述各时代思想的体系、派别,及其演进的进程,是为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①。那虽然是几年之后的事,看来却也是他编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指导原则^②。欧洲有文学理论批评学科,中国历代也有许多人提出过文学理论见解,因此有必要系统采择古代材料以见纲要,并各各探察其作为依据的原则。这就是陈中凡心目中文学批评史的最基本的内容。在学科建设的开端,他就已经尽可能兼顾到西方较为精密的理论和汉语文学的特殊之处,这是十分可贵的。

陈氏著作出版后的第七年,即1934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史上极其重要、极其辉煌的一年。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世界书局出版了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人文书店出版了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在此之前,1931年,朱东润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其讲义数易其稿,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他1935年之前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发表论文,其中有关文学批评史的有九篇,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中古以后;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1944年出版,罗氏《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

① 原载199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之蔡尚思《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卷首,后收入《陈中凡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8页。

② [美]雷纳·韦勒克在《近代文学批评史·导论》中说,“批评史是一个有其内在意义的课题……它完全是思想史中的一个分支”,“我们的目的毕竟主要是对各种思想的了解”。见该书第9页,杨岂深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批评史是思想史,这显然是现代才有的学术观念。

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1943年出版。这几部著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定了基础，建立了架构。几位拥有强大学术实力的学者不谋而合，几乎是同时发表精心撰著的各有特色的成果，一个新的学科终于建立起来了，他们是这个学科的奠基者，以上几部著作，是这个学科创建期的基石。

郭绍虞把乾嘉学风的传统和西方近代学术的实证精神相结合，十分重视资料的搜集整理，但他不是简单堆砌资料，而是把有准备、有目的地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来的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这里就涉及一个“循环”——要有独立的观念、见解，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材料，怎样考订、整理材料，才能对材料作出阐释；而观念、见解的形成、深化、检验和论证，都需要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之上。古代原来缺乏系统的文学批评史材料，是因为古人缺乏明确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史的观念，甚至缺乏明晰的文学观念。郭绍虞首先从这一基本点入手，以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新的语境下对于文学、文学批评的认识为出发点，重新搜集材料。研究者对文学、文学批评没有自己的见解，怎么决定寻找史料的方向，如何鉴别，如何取舍？然而古人对文学、文学批评的见解与研究者并不完全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不尽相同。倘若以今例古、强古从今、以古证今，那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这又给史料的发掘和选择出了难题。

郭绍虞治学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把文学理论批评现象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环境中进行研究，借助于其他多种学科的手段来研究。其批评史第四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开头说，“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所以学术思想风气之转移又常足以左右文学批评的主张”。周秦时代文学批评史与学术史难以截然区分，固不待言；六朝纯文学的思想得以建立、流播，也因为儒家学术思想的消沉；唐宋之后，讲载道，讲复古，文学思想均以学术思想为依归。尤为可贵的是，他依仗自己对中国语言文字特性的深刻了解，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提出许多独到见解。本书作者吸取前辈论著的营养，在这一点上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20世纪的西方史学，经历了由客观主义向主体主义的转变。科林伍德史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影响深远。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库恩再三强调，科学史必须依赖科学哲学，“科学史需要哲学，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的基本工具不只是科学知识，而且还需要哲学观点”。“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握他所研究的时期和领域的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好，是不可能的。”^①一门学科的历史不能只是描述单个

^① [美]库恩：《必要的张力》，纪树立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4~15页。

的分散的历史事件、个案,它还应该具有解释性,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也可以说,学科史的研究既要在学科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又要担负充实发展学科理论的任务。文学批评,本身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的成果,批评史家需要指明过去的批评家的思想何以能够提炼出来和怎样被提炼出来。科林伍德讥讽传统史学是剪刀加浆糊的剪贴史学,他认为:“历史想像力严格说来,却不是修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①本书的作者们接受了更多的近现代史学观的影响,在“构造性”上下了更大的力气,显出了他们的学术个性。

本来,前辈们也是在不停地探索中前进。在早期出版的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罗根泽的一种是序言写得最长的,对学科建设的原则、前提、基础,作了认真而深入的论述。他对于为什么要研究文学批评史,有了比其他几家更加明晰的看法。他说:“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藉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这很明显的比郭绍虞、方孝岳进了一步。文学批评史的主要功能,不是止于帮助人们深一步理解文学史,也不止于提供文学批评史料,帮助人们了解某个古代批评家的著作和观点,批评史的最高任务是总结历代人们在文学问题上理论思维的经验 and 成果,增进和提升对文学的形而上的把握与理解,最终落实到对于今后文学的指导,当然是包括对文学的创作、批评和接受诸多方面的指导。

本书作为新世纪的教材,力图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层面揭示古代文论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道释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主编和各位作者多年来已经在这些方面做过系统性的研究,所以能够成一家之言,相信会对本学科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王先霭

2002年5月16日

^① [英]科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214页。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先秦文论	(20)
第一节 先秦文论概述	(20)
第二节 孔子及儒家文论	(28)
第三节 老庄及道家文论	(37)
第四节 《易传》儒道兼综的文论思想	(44)
先秦文论选录	(50)
第二章 两汉文论	(67)
第一节 两汉文论概述	(67)
第二节 《淮南子》的道家文论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75)
第三节 《乐记》、《诗大序》和董仲舒的文论：儒家文论之总结	(81)
第四节 扬雄、王充的文论和王逸的屈原论	(90)
两汉文论选录	(102)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文论	(113)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文论概述	(113)
第二节 玄学才性论与曹丕《典论·论文》	(122)
第三节 陆机《文赋》的创作心理学思想	(129)
第四节 刘勰《文心雕龙》与三教合流	(136)
第五节 钟嵘《诗品》的诗歌理论	(147)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录	(158)
第四章 唐宋金元文论	(170)
第一节 唐宋金元文论概述	(170)
第二节 载道与取境：唐代文论中的儒与道释	(180)
第三节 苏轼、严羽及宋代文论的以禅喻诗	(190)
第四节 元好问及金元文论	(201)

唐宋金元文论选录·····	(207)
第五章 明清文论 ·····	(224)
第一节 明清文论概述·····	(224)
第二节 从李贽到金圣叹:异端思潮下的小说评点·····	(234)
第三节 王骥德、李渔及明清戏曲理论·····	(242)
第四节 王夫之、叶燮及明清诗词理论·····	(250)
明清文论选录·····	(261)
第六章 近代文论 ·····	(292)
第一节 近代文论概述·····	(292)
第二节 龚自珍、刘熙载及传统文论之总结·····	(299)
第三节 梁启超、王国维及近代文论之开启·····	(304)
近代文论选录·····	(313)
后记·····	(336)
修订后记·····	(338)

导 论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文化事实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20世纪已经问世的几部古代文论教材,或留意于“史”的梳理或倾心于“论”的辨析,却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化血肉相连的“史”、“论”事实。本书作为新世纪的新教材,力求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道释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沿着这一思路,本书力图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层面揭示古代文论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一、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背景

古汉语“文化”一词的本义是“以文教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释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以化成天下也。”以“人文”来“化成天下”,一方面构成“文化”一词“以文教化”的基本内涵,同时也隐含着“文化”与“文学”的某种天然联系。

“文化”与“文学”,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它包括了物质制造(技术体系)和精神创造(价值体系)两大部分;而狭义的“文化”则仅指人类精神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①。大家知道,狭义的“文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的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而上古时期,所谓“文学”还是泛指一切见诸于“文”的东西,也就是刘

^① 关于“文化”的定义,请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以及马敏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